

社交（sociabilité）： 歐洲近代史的核心教學概念

楊彥彬^{*}

摘要

二戰之後，歐美世界通史教材中有關啟蒙運動的敘述內容出現相當大的變化：1950 年代的教學以介紹有名望的文人作家為主，到了二十一世紀初期則轉而聚焦造成菁英思想擴散的場所與媒介。本文試圖從二十世紀後半期西方學術界近代史研究視角的轉變，探討教學課程內容之所以產生異動的知識背景。

關鍵詞：社交、啟蒙運動、觀念史、社會史、日常生活史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一、前言

2019 年 6 月，筆者任教的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世界史教師出缺，經由系上安排，擔任世界通史課程中近現代史的授課任務。此外，當時世界通史課程使用的英文教科書也面臨更換：系上該課程一直採用《世界文明史》做為指定教材，但是此書已於 2017 年絕版，經過系上世界通史任課教師討論之後，改用 2018 年出版的《西方：一部新的歷史》。筆者在準備世界通史課程中涉及啟蒙運動的內容時，曾經參考上述兩本教科書，發現介紹的角度有相當大的差異，於是興起撰寫此文的念頭。

去年剛剛出爐的《西方：一部新的歷史》是由任教於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兩位歷史學者主筆，格拉夫頓（Anthony Grafton, 1950-）負責撰寫史前史到宗教改革，而貝爾（David A. Bell, 1961-）則處理文藝復興以降直到現代的歷史。兩位作者在共同署名的〈序言〉中特別指出，這本教科書試圖把最新的學術研究成果納入其中。¹筆者認為這個宣示完全呼應書名副標題中的「新」歷史，而且可以從兩方面觀察其實際落實的狀況。首先，格拉夫頓與貝爾都主張，西方從來就不是一個可以簡單識別的明確單一概念，因為今天被稱為「西方」的地區其實是與外界不斷交互作用的過程中所出現的產物，所以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西方的歷史不單單只是歐洲人

¹ Anthony Grafton and David A. Bell, *The West: A New History*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2018), p. lxiv.

的歷史。²這個看法使得《西方：一部新的歷史》雖然以西方為書名，但是敘述主軸卻遠遠超出西方，以全球為範圍（a global scale）。³

其次，《西方：一部新的歷史》注意日常生活以及「通常不為我們所知的男男女女」。⁴例如，在談論啟蒙運動的篇章中，特別以一小節的篇幅處理「文化轉型」（cultural transformation），而此議題主要由兩個角度來談：一為讀寫能力的擴張，敘述雜誌與小說的興起、女性讀者群的出現；二為公共文化（public culture）的成形，討論畫展、音樂會、公共圖書館、咖啡館、沙龍、科學團體在社會上蓬勃發展，而這些提供不同階層人士社交機會的「新社會環境」（new social settings）使得上層的男性菁英文化得以往下層滲透普及，也可以跨越性別流通。⁵談完十八世紀西方社會傳播文化的社交集會之後，《西方：一部新的歷史》再提及有助於啟蒙思想擴散的兩種文字載體，也就是小說與地下出版品。前者書寫的對象並不是學者以及君王，而是具有讀寫能力、造訪沙龍或咖啡館的「新公眾」（new public），這使得小說必須以詼諧、聳動的風格撰寫，最明顯的例子是孟德斯鳩（Charles-Louis de Secondat, baron de La Brède et de Montesquieu, 1689-1755）的《波斯人書簡》（*Lettres Persanes*）、伏爾泰（François Marie Arouet de Voltaire, 1694-1778）的《慫

² Anthony Grafton and David A. Bell, *The West: A New History*, p. lxi.

³ Anthony Grafton and David A. Bell, *The West: A New History*, p. lxiii.

⁴ Anthony Grafton and David A. Bell, *The West: A New History*, p. lxii.

⁵ Anthony Grafton and David A. Bell, *The West: A New History*, pp. 514-519.

第德》(*Candide*)。至於地下出版品，雖然當時統稱「哲學書籍」('philosophical' books)，但是這個類別的著作內容龐雜，不只包括狹義的哲學作品，還有宮廷八卦、情色文學。⁶

相較之下，《世界文明史》介紹啟蒙運動的內容就顯得相當單調。該書由美國歷史學者柏恩斯(Edward MacNall Burns, 1897-1972)撰寫，第一版於 1955 年問世，之後迭經多次增補，最近的第九次修訂本在 1997 年出版。《世界文明史》在題名為「哲士的世界」之小節，以個人為單位，分別介紹伏爾泰、孟德斯鳩、狄德羅(Denis Diderot, 1713-1784)等人的事蹟與著作，⁷內文沒有觸及知識傳播與菁英文化向下滲透等問題。《世界文明史》敘述啟蒙運動的方式，好像建議讀者一旦通讀個別啟蒙思想家的著作，就等於瞭解啟蒙這段歷史，並且具備解釋接下來歐洲政治、社會面臨劇烈變動的能力。

經由上述兩本世界通史教科書內容的比較，我們明顯可以觀察到教學內容的變動：《世界文明史》以著名的啟蒙哲士為主軸，認為只要各自介紹他們的思想就足以構成啟蒙運動的歷史圖像；《西方：一部新的歷史》則強調，想要瞭解十八世紀的啟蒙風潮，就必須先討論思想在當時的傳播管道，才有可能理解上層菁英想

⁶ Anthony Grafton and David A. Bell, *The West: A New History*, p. 525.

⁷ Philip Lee Ralph, Robert E. Lerner, Standish Meacham, Alan T. Wood, Richard W. Hull, Edward McNall Burns, *World Civilizations: Their History and Their Culture*, ninth edition, vol. 2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1997), pp. 153-161.

法在社會各個層面的擴散，進一步形成改變社會現狀的潛在力量，因此這種社會力量的營造是一種集體的成果，才能秀異的個別哲士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們或許可以說，從二十世紀後半期到二十一世紀初期，啟蒙運動的歷史教學從拼貼式的靜態圖像轉變成為聯繫整體的動態過程，這種教學內容的改變極可能與學術界的研究走向密切相關。

二、從觀念史到觀念的社會史

十九世紀以降，深受浪漫主義稱揚感性、鄙視理性的看法影響之下，十八世紀啟蒙運動被視為是「淺薄的」(shallow Enlightenment)，⁸而卡西勒(Ernst Cassirer, 1874-1945)之所以撰寫《啟蒙運動的哲學》正是為了啟蒙運動的重要價值辯護。這本出版於1932年的思想史名著強調，把理性與科學視為人類最高能力的啟蒙時期不能也不應被抹煞，人們不必從十九世紀的觀點，而是要以啟蒙時期自己的樣貌才能正確理解十八世紀的哲學思想。⁹為了精準掌握這段時期的思想發展過程，這位德國學者決定以觀念史的研究取徑為核心，¹⁰試圖釐清啟蒙哲學的「諸多內在構成力量」(the inner formative forces)。¹¹他認為啟蒙運動的哲學建立在「少

⁸ Ernst Cassirer, *The Philosophy of Enlightenment* (1932), 'Preface', translated by Fritz C. A. Koelln and James P. Pettegrove, with a new foreword by Peter Gay (Princeton and Lond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xvii.

⁹ Ernst Cassirer, *The Philosophy of Enlightenment*, 'Preface', p. xvii.

¹⁰ Ernst Cassirer, *The Philosophy of Enlightenment*, 'Preface', p. xvi.

¹¹ Ernst Cassirer, *The Philosophy of Enlightenment*, 'Preface', p. xii.

數的偉大基本觀念」(a few great fundamental ideas) 之上，¹²從這幾個觀念出發，整個十八世紀哲學呈現極為一致的外貌。於是，在卡西勒眼中，啟蒙哲人的思想雖然看似紛繁雜亂，但是啟蒙運動卻是一個整體，是由理智的力量在背後推動：「它僅僅只是整個理智發展的一個部分與一個特殊階段」，¹³而這場歐洲「思想革命」(the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的頂點則是康德 (Immanuel Kant, 1724-1804) 完成其《純粹理性批判》。¹⁴雖然卡西勒的研究成果得以修正當時對於十八世紀的一般誤解，但是因為他只關注尋找少數觀念之間的內在邏輯，這使得《啟蒙運動的哲學》研究視角顯得相當狹隘。2009 年，已經進入耄耋之年的美國史家蓋伊 (Peter Gay, 1923-2015) 應邀為卡西勒著作的新版寫序，蓋伊不禁感嘆：由於注重理性思辨的哲學議題，卡西勒筆下的啟蒙運動全部由心理學、認識論、宗教與美學等議題構成，缺乏政治與社會外部背景的探討。¹⁵從這個評論來看，我們不難理解青年時期的蓋伊在研究啟蒙運動史所面臨的挑戰。

早在 1959 年，蓋伊已經於其《伏爾泰治政學》中指出，觀念史研究存在著重大的盲點，也就是經常忽略觀念與現實之間的關

¹² Ernst Cassirer, *The Philosophy of Enlightenment*, 'Preface', p. xvi.

¹³ Ernst Cassirer, *The Philosophy of Enlightenment*, 'Preface', pp. xi-xii.

¹⁴ Ernst Cassirer, *The Philosophy of Enlightenment*, 'Preface', p. xvii.

¹⁵ Peter Gay, 'Foreword', in Ernst Cassirer, *The Philosophy of Enlightenment*, p. viii. 此外，把啟蒙運動等同於當時重要思想家的書寫手法，還可以參見：Isaiah Berlin, 'The Philosophers of Enlightenment', *The Power of Ideas*, edited by Henry Hardy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36-52.

聯性，所以他想書寫「觀念的社會史」(the social history of ideas)，試圖不把觀念簡單化約為環境產物的情況之下，從所有的面向瞭解觀念。¹⁶「觀念的社會史」使得蓋伊能夠走出一條不同於卡西勒書寫啟蒙史的道路：不只探討各種觀念前後傳承的邏輯關係，更把觀念的構思與發展放進啟蒙時期文人的生活世界之中，而這種研究構想充分體現在蓋伊出版於 1960 年代的另一部著作《啟蒙運動：一個詮釋》。

這部巨著分成兩冊，分別於 1966 年以及 1969 年出版。蓋伊在第一冊的〈序言〉中表明：他不僅想要處理啟蒙思想家之間彼此觀念的互動，還要討論這些思想家浸潤其中的「文化氛圍」(a cultural climate)，這使得他「從思想史走向社會史」。¹⁷這種分析視角的移動更具體落實在第二冊〈序言〉所提到的主題：分析哲士們所處身的環境，也就是「經濟與文化變遷」。¹⁸綜觀蓋伊的寫作構想，我們或許可以說，《啟蒙運動：一個詮釋》第一冊的研究主軸延續卡西勒的思想史研究傳統，探討啟蒙思想的文化淵源，但是蓋伊觀察啟蒙思想的時間軸與卡西勒不同：後者聚焦於於十

¹⁶ Peter Gay, *Voltaire's Politics: the Poet as Realist* (1959), 'Preface to the Vintage editi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5), p. viii.

¹⁷ Peter Gay, *The Enlightenment: An Interpretation, vol. 1: The Rise of Modern Paganism* (1966), 'Preface'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Press, 1995), p. xi.

¹⁸ Peter Gay, *The Enlightenment: An Interpretation, vol. 2: The Science of Freedom* (1969), 'Preface'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Press, 1996), p. ix.

八世紀，最多也只追溯啟蒙觀念到十七世紀；而蓋伊卻選擇從中古晚期、歷經文藝復興時期直到十八世紀，以長時段的角度展現西方文人對於古代希臘羅馬作品持續展現的濃厚興趣，並且聚焦「今人」挪用古人觀點於當時情境，做為攻擊現狀的思想武器，例如嘲弄《聖經》中可笑的記載，以及羅馬教會所大力支持的荒謬教義。

與卡西勒一樣，蓋伊也主張，雖然這些啟蒙思想家們的想法不盡相同，經常爭論不休，但是他們畢竟擁有明顯的共同特色，於是這位美國歷史學家決定使用「家庭」(a family) 這個語詞凸顯啟蒙運動的單一性。¹⁹然而，蓋伊強調：「一致並不意謂意見相同」，家庭成員彼此大力批判的結果，導致啟蒙思想家的家庭是一個激烈爭執的家庭(a stormy one)。²⁰在蓋伊的眼中，這個家庭成員人數不多，只有「一小撮哲士」(the little flock of philosophes)，而且雖然他們具有共同性，巴黎是他們的總部，法文是溝通的共同語言，但是卻是屬於全然無組織的非正式結合。²¹

不只主張十八世紀的啟蒙是具有高度一致性的思想運動，蓋伊在《啟蒙運動：一個詮釋》第一冊中還不忘說明啟蒙哲士所具備的待人處世特色：他們是世俗文人，且是科學的業餘愛好者，雖然博學多聞，思慮清晰，卻也能言善道，擅長交際，好相處，

¹⁹ Peter Gay, *The Enlightenment: An Interpretation*, vol. 1, pp. x, 4.

²⁰ Peter Gay, *The Enlightenment: An Interpretation*, vol. 1, p. 4.

²¹ Peter Gay, *The Enlightenment: An Interpretation*, vol. 1, pp. 3, 10.

並不呆板乏味。²²雖然第一冊涉及文人生活的篇幅不多，但是有關啟蒙時期文人喜好交際的少數描述已經為第二冊的寫作主題埋下伏筆。

前面已經提過，蓋伊計畫於《啟蒙運動：一個詮釋》第二冊中討論哲士處身的環境，這個主題最明顯呈現在題名為「文壇」(the Republic of Letters)的第二章第一節。蓋伊認為，十八世紀面臨重大的經濟與文化變動：識字能力的提升促使閱讀人口增加，這些潛在的讀者活絡出版市場，帶動文人作家收入的提升與獨立精神的出現，創作品味不再受制於高傲又善變的貴族贊助人。²³這個新崛起的閱讀群體主要是由受過「半吊子教育的資產階級」(a half-educated bourgeoisie)所組成，²⁴他們屬於中等階層，男女都有，雖不熟悉做為學術語言的拉丁文，卻有能力閱讀以本國語言書寫的作品，而且比底層平民具備更高尚的鑑賞能力。²⁵正是這些日漸增長的讀者支撐文壇的存在。然而，文壇組織鬆散，或者更確切的說，根本沒有組織，文人藉以維繫彼此關係的工具，不外乎晚宴以及通信。²⁶

除了閱讀人口的增長之外，十八世紀歐洲的文化變動還包括傳播知識的場所與媒介更加多元，而這個發展進一步促成新知識

²² Peter Gay, *The Enlightenment: An Interpretation*, vol. 1, pp. 10, 14.

²³ Peter Gay, *The Enlightenment: An Interpretation*, vol. 2, pp. 57-61.

²⁴ Peter Gay, *The Enlightenment: An Interpretation*, vol. 2, p. 44.

²⁵ Peter Gay, *The Enlightenment: An Interpretation*, vol. 2, p. 61.

²⁶ Peter Gay, *The Enlightenment: An Interpretation*, vol. 2, p. 79.

的傳播。以聚會的場所來說，蓋伊在《啟蒙運動：一個詮釋》第二冊中的討論大致可以分為兩種，體制化的與非體制化的聚會團體：前者屬於知識色彩濃厚的學會、科學院，成員大多為社會中上層菁英，每年有固定的集會場次，並且發行定期學術刊物，舉辦有獎金的論文競賽；非體制化的聚會場所則以帶有交誼性質的沙龍與咖啡館為大宗，參與者的身分較為複雜。²⁷從篇幅來看，蓋伊顯然側重菁英文人的體制化集會，例如法蘭西學院（*Académie Française*）的敘述篇幅長達數頁，遠遠多於咖啡館的幾行文字。至於蓋伊提到有助於知識普及的大眾媒介，大致可以分為文字與非文字，前者為小說以及定期刊物（包括日報與周刊），後者有戲劇與繪畫。²⁸蓋伊固然注意到知識普及於非菁英人物的議題，但是從《啟蒙運動：一個詮釋》的參考史料來看，蓋伊的關愛眼神還是投注於大咖人物的著作之上，這從他以重要啟蒙哲士的生卒年為依據，把啟蒙運動劃分為三個世代的態度緊密相關：第一世代由孟德斯鳩與伏爾泰領軍，而休謨（David Hume, 1711-1776）以及狄德羅隸屬於第二世代，至於康德則側身第三世代之中。²⁹

整體來說，雖然蓋伊已經看出觀念史研究的侷限，並試圖以社會史的角度彌補其不足，但是《啟蒙運動：一個詮釋》呈現出來的缺點卻非常類似卡西勒的著作：側重上層菁英觀念之間的傳

²⁷ Peter Gay, *The Enlightenment: An Interpretation*, vol. 2, p. 9.

²⁸ Peter Gay, *The Enlightenment: An Interpretation*, vol. 2, pp. 44, 51-52.

²⁹ Peter Gay, *The Enlightenment: An Interpretation*, vol. 1, p. 17.

承與對立，而不是考察思想如何在十八世紀社會之中擴散傳播，更不用說重建十八世紀人士的社會生活。然而，早在《啟蒙運動：一個詮釋》出版之前，德國社會學家哈伯瑪斯 (Jürgen Habermas, 1929-) 已經嘗試探索啟蒙觀念的擴散管道，但是蓋伊在他的著作中卻完全沒有提到哈伯瑪斯的研究。

1962 年，哈伯瑪斯出版《公共領域結構的轉型》，研究近代西方社會公共領域的興起過程，特別著重探討爭取自由權利公共輿論的社會脈絡。哈伯瑪斯認為，社會可以劃分為由國家政府掌控的公權力領域與以市民活動為主的私領域，而公共領域則介於上述兩種領域之間；³⁰公共領域的主角是「公眾」(the public)，這些公眾公開運用他們的理性，批評國家公權力的政策，³¹所以他們是公共輿論的載體，促使輿論發揮監督國家政策的功能，³²這使得公共領域帶有濃厚的政治批判色彩。政治性公共領域在十八世紀末出現，屬於市民社會的一部分，然而，最初的公共領域並不具備政治批判功能，僅僅具有文學性質，而公共領域的轉型涉及皇室宮廷之外的兩個重要「新機構」(new institutions)：法蘭西的沙龍與英格蘭的咖啡館。³³哈伯瑪斯花了將近整個第二章的篇幅說明這

³⁰ Jürgen Habermas,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1962), translated by Thomas Burger with the assistance of Frederick Lawrence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89), p. 30.

³¹ Jürgen Habermas,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p. 27.

³² Jürgen Habermas,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pp. 2-3.

³³ Jürgen Habermas,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p. 31.

兩個新興集會場所的演進史。

沙龍起源於十七世紀的法國貴族社交圈：他們在私人宅邸飲宴，談文論藝，逐漸取代舉行繁文縟節慶典的宮廷。雖然早期沙龍足以呈現體面文雅的文化面向，但是由於無法擺脫對於貴族主人的依賴，造成聚會之時的社交談話（*sociable discussions*）難以轉變成為激烈的時政批評。³⁴但是隨著商業貿易逐步興盛，資產階級在經濟層面佔有優勢地位，透過金錢買得官職，甚至取得該官職的世襲地位，成為與傳統「劍貴族」並肩的「袍貴族」。於是，富裕的資產階級人士從舊有的經濟依賴狀態下解脫出來，不只文藝創作不再受到恩庇體制（*patronage*）贊助者品味的宰制，連發表的意見也更加獨立自主。此外，這些袍貴族與學識豐富的第三階級平民也打入沙龍聚會中，與親王子弟立於平等的地位，而且甚至到了十八世紀，沒有任何一位重要的作家不把他們的重要觀念、新著作、新樂曲先在沙龍聚會中發表，以聆聽他人意見，這使得沙龍聚會從獻殷勤、取悅女性的言談走向以文藝知識，甚至政治議題的討論。³⁵

與法國沙龍聚會相比，英格蘭的咖啡館則歷經光榮革命、十八世紀前半期的托利黨與惠格黨之爭，政治性質較為強烈。大約在十七世紀中，咖啡已經成為當時有錢人士的普遍飲料，而且到了十八世紀初期，光是倫敦一地已有三千家咖啡館，許多著名作

³⁴ Jürgen Habermas,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p. 31.

³⁵ Jürgen Habermas,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pp. 33-35.

家在這些地方聚會，談論的主題不只文學藝術，有時也激烈批評國家事務，³⁶這使得咖啡館被當局視為「政治動亂的溫床」(seedbeds of political unrest)，³⁷以文學與藝術為主題的聚談，逐漸開始擴大到政治與經濟的論辯。

雖然沙龍與咖啡館都是當時新興的聚會體制，但是雙方的參與者卻出現相當大的差異：後者歡迎負擔得起一杯咖啡價錢的人入內，使得「較為廣大的中等階級（包括工匠與店主）」得以與貴族、富裕地主討論共同話題，消費者的身分地位來源複雜；相較之下，沙龍聚會只向宮廷貴族、城市貴族以及少數資產階級上層人士打開大門，顯得較為封閉。³⁸但是，沙龍與咖啡館的意見傳播管道都以口語為主，在這兩個社交場合之中，論辯技巧、談吐端莊可能遠比文字書籍更為重要。此外，當時逐漸增加的劇院、博物館、音樂會，也提供書本以外的管道給「公眾」接觸知識的機會。³⁹從這裡，我們可以瞭解：十八世紀觀念傳播的管道不是只有書本閱讀，也包括口語交談。難怪狄德羅曾經說過：「我們的文字著作只對某一個階級的公民產生影響，但是對談討論 (discours) 則影響所有階級的公民。」⁴⁰從這位法國啟蒙哲士的看法，我們可

³⁶ Jürgen Habermas,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pp. 32-33.

³⁷ Jürgen Habermas,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p. 59.

³⁸ Jürgen Habermas,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p. 33.

³⁹ Jürgen Habermas,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p. 43.

⁴⁰ 轉引自：Jürgen Habermas,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p. 257, note 15. 狄德羅的法文原文為：Nos écrits n'opèrent que sur une classe de citoyens, nos discours sur toutes.

以得知，啟蒙思想擴散的過程中，談話有時比文字更重要。

口語固然是十八世紀意見交流的重要管道，但是哈伯瑪斯並沒有忘記文字著作在輿論形成過程之中所扮演的角色。在《公共領域結構的轉型》第三章，這位德國學者特別注意可以把菁英思想向社會中下層滲透的通俗作品：期刊、雜誌與小說。當時咖啡館中的時政批評者可以在惠格黨人與托利黨人撰寫的報章雜誌政論文章中，獲得取之不竭的助談之資，而政治性報紙與諷刺小說的出現，更造成文學與政治結合，促使英格蘭的文學公共領域逐漸變為政治公共領域。⁴¹

咖啡館、沙龍、報刊、通俗著作中形成的意見逐漸成為我們今天習以為常的「公共輿論」(public opinion)。追溯此語詞的演變狀況之後，⁴²哈伯瑪斯指出，到了十八世紀晚期，公共輿論是指「具有自我判斷能力之公眾所形成的批判反省」，⁴³而理性的運用是批判反省能力的重要先決條件，他接下來援引康德在 1784 年發表的〈答何謂啟蒙？〉一文中對於啟蒙的著名定義做說明：

啟蒙是人類脫離他自己導致的未成年狀態。未成年狀態是沒有他人的指導，就無法使用自己的知性的那種無能。⁴⁴

⁴¹ Jürgen Habermas,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pp. 59-60.

⁴² Jürgen Habermas,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pp. 57-64, 89-95.

⁴³ Jürgen Habermas,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p. 90.

⁴⁴ Jürgen Habermas,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p. 104. 由於哈伯瑪斯改寫部分康德原文，為求精確還原，筆者參閱另一版本的康德〈答何

雖然蒙昧狀態是自作孽所造成的，而且個人較難透過自我的力量達到啟蒙，但是如果可以借助公眾 (the public) 力量，也就是持續與他人交流，可能較易培養出獨立思考的能力，換句話說，在康德眼中，群體交往互動的公共領域足以使得身處其中的個人公開且自由的使用理性。⁴⁵

卡西勒與蓋伊曾經各自在他們的著作中引用康德這篇文章，但是兩者都從思想史的角度聚焦於該文中的名言「大膽認知」(sapere aude)，並由此強調運用理性思辨以求知的重要性。⁴⁶然而，與卡西勒和蓋伊不同，哈伯瑪斯則從知識社會史的視角切入，注意到〈答何謂啟蒙？〉中所涉及的觀念傳播議題。雖然在〈答何謂啟蒙？〉一文中，康德設想的意見交流方式只是文字著作，完全沒有提到口語傳播的重要性，⁴⁷然而，他並不是一位只聚焦於文字溝通的學者：哈伯瑪斯發現，康德在 1788 年出版的《實踐理性批判》中曾經強調，公共領域不只是學者和哲學家的禁脔，商

謂啟蒙？〉的全文英譯：Kant, “An Answer to the Question: ‘What is Enlightenment?’”, in *Political Writings*,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Hans Reiss, translated by H. B. Nisbet, second e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54. 此外，中譯文字參見：Immanuel Kant 著，李明輝譯，〈答何謂啟蒙？〉，收入《聯經思想集刊》，第一期（臺北：聯經出版，1988），頁3。

⁴⁵ Kant, “An Answer to the Question: ‘What is Enlightenment?’”, p. 55.

⁴⁶ Ernst Cassirer, *The Philosophy of Enlightenment*, pp. xvii, 163; Peter Gay, *The Enlightenment: An Interpretation*, vol. 1, pp. 3, 20-21.

⁴⁷ Jürgen Habermas,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p. 105. 可參閱：Kant, “An Answer to the Question: ‘What is Enlightenment?’”.

人與婦女也是其中重要成員，因為在後兩者所活躍的沙龍中，「除了說故事與聊天打屁之外，他們還有其它娛樂，也就是討論辯難（arguing）」。⁴⁸康德這個看法正好呼應哈伯瑪斯的觀察：整個十八世紀期間，公共領域的出現有助於部分社會人士進行意見交流，進而形成公共輿論，而溝通意見的媒介包括言語對談的聚會以及供人閱讀的通俗小說。

在《公共領域結構的轉型》第二章討論小說的段落中，哈伯瑪斯已經敏銳指出，十八世紀風行的書信體以及日記體小說都與個人意識的覺醒有關，而個人意識之興起則與當時家庭結構、建築風格的變化密切相關：核心家庭取代大家庭，而中古時期以大家庭為主的大房間，到了近代則被重新分隔成許多小房間，以提供家中個別成員單獨使用，這種「私人化的過程」（process of privatization）使得住家空間的規劃變得更為個人化，也較為自在舒適，但是核心家庭的公共活動空間卻越來越狹窄。⁴⁹雖然這個有關「生活私人化」（the privatization of life）的分析視角在《公共領域結構的轉型》中所占篇幅不長，但是明顯帶有更為廣闊的社會史眼光：觀念傳播的研究不再只關注涉及思想觀念的狹義社會體制，更走向涵蓋面更為廣闊的私人日常生活。蓋伊的《啟蒙運動：一個詮釋》雖然出版在《公共領域結構的轉型》之後，但是

⁴⁸ 轉引自：Jürgen Habermas,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p. 106.

⁴⁹ Jürgen Habermas,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pp. 44-51.

哈伯瑪斯較為廣闊的研究視角卻沒有展現在蓋伊的著作之中：後者只注意到學會、沙龍在觀念傳播過程中扮演重要功能，卻沒有延伸到日常生活的議題之中進行討論。然而，我們至少在這兩位學者的研究取徑看到，1960 年代西方學界的十八世紀研究逐步往社會史的視角推移。至於更為細緻的日常生活社交網絡之研究，要到 1970 年代之後，法國史家以微觀視角考察近代法國社會才得以看到初步成果。

三、從社會史到日常生活史

從日常生活史的角度討論觀念傳播的開山著作可能是勒華拉杜里 (Emmanuel Le Roy Ladurie, 1929-) 出版於 1975 年的《蒙大猶》。坦言不做政治事件史，⁵⁰ 只想重建有血有肉的農民社會，這位法國史家不只實地造訪這個位於法國西南部庇里牛斯山的小村莊，考察並親身感受當地的民情風俗，⁵¹ 還在富尼耶 (Jacques Fournier, 1285-1342，日後成為教宗本篤十二世) 遺留下來的宗教裁判審訊資料中找到有關蒙大猶日常生活的珍貴記錄：從物質生活到思想信仰，這批口供資料都提供鉅細靡遺的記載。⁵² 由於純潔派 (Catharisme) 或稱之為阿爾比異端 (l'albigénisme) 入侵蒙大猶，時任帕米耶主

⁵⁰ Emmanuel Le Roy Ladurie, *Montaillou, Village Occitan, de 1294 à 13249* (1975), édition revue et corrigée (Paris: Gallimard, 1982), p. 37.

⁵¹ Emmanuel Le Roy Ladurie, *Montaillou, Village Occitan, de 1294 à 13249*, pp. 19, 575.

⁵² Emmanuel Le Roy Ladurie, *Montaillou, Village Occitan, de 1294 à 1324*, p. 10.

教的富尼耶奉命審問異端份子。從1318年到1324年，富尼耶陸續進行578場偵訊，其中418次是由被告親自到庭應訊，另外160次則是聽取他人供詞：從性別的角度來看，被起訴的114人之中，有48位女性；由社會階層的分布來觀察，除了少數幾位貴族、教士與公證人之外，其他絕大部分都是農民、工匠、牧羊人等平民百姓；此外，為了方便進行犯罪嫌疑人的交叉對質，審訊者詢問大量日常生活細節，以查證供詞的可靠性。⁵³所以，這批審判資料不只涵蓋當地社會中所有階層的居民，而且男性與女性都包括在內，意外保留了完整的農村日常生活狀況，尤其是異端信仰者的人際網絡。

勒華拉杜里認為，如果要討論文化或宗教心態，就一定會觸及傳播議題。⁵⁴在蒙大猶，純潔派傳播的最大溫床是住家，因為異端一旦打入某家庭，不只該家庭成員相繼皈依，而且還會隨著家庭社交網絡向外擴散，從一家傳到另一家，⁵⁵所以考察當地異端擴散網絡之時，不能忽略由家庭延伸出來的具體人際關係。這些關係網絡把這個家庭與當地其他家庭聯繫起來，由點連成線，再進一步交織成面：親戚、婚姻是血緣關係，結拜兄弟與教父教母則屬於人為親屬關係（*parenté artificielle*），⁵⁶如果再加上友誼、職業、信仰、婚外情所衍生出來的人脈，蒙大猶居民身上可能疊合著多

⁵³ Emmanuel Le Roy Ladurie, *Montaillou, Village Occitan, de 1294 à 1324*, pp. 15-16.

⁵⁴ Emmanuel Le Roy Ladurie, *Montaillou, Village Occitan, de 1294 à 1324*, p. 345.

⁵⁵ Emmanuel Le Roy Ladurie, *Montaillou, Village Occitan, de 1294 à 1324*, pp. 53-56.

⁵⁶ Emmanuel Le Roy Ladurie, *Montaillou, Village Occitan, de 1294 à 1324*, pp. 182-183.

重的社交網絡，而這些複雜多元的往來對象可能又另外組合出不同的資訊流通平台，⁵⁷甚至最後形成休戚與共的利益共同體。⁵⁸

根據富尼耶的審訊資料，勒華拉杜里指出，家庭中的社交活動通常是夜間聚會 (la veillée)。從房屋格局來看，這些彼此關係密切之人的聚會地點在住家的廚房，當地人稱之為「家中之家」(la maison dans la maison)，傳播訊息的方法屬於即興談話：「人們在此吃飯、死亡、接受異端、談論信仰的秘密以及村莊八卦。」⁵⁹參加聚會的人數不定，聊天話題多樣。如果出席人士彼此信任度極高，談論主題就會涉及異端信仰；若有比較不熟的外人在場，就避談禁忌話題。⁶⁰夜間聚會中，傳播知識的要角通常是年長、社會地位較高的人士，也就是說，文化是從年長者的嘴巴傳遞給年輕人。⁶¹而且農民的小孩一般都不上學，他們的知識與文化都來自於日常生活中與他人的接觸：與父母共同工作的場合，或是在家裡的餐桌旁，都有機會聆聽年長者的經驗分享。⁶²所以，勒華拉杜里合理推測：奧堤耶兄弟 (les Authiés) 傳教成功的秘訣除了人脈廣、深入基層之外，還包括他們的年齡較大。⁶³

蒙大猶有一些提供聚會的公共場所，例如小酒館，但設備不

⁵⁷ Emmanuel Le Roy Ladurie, *Montaillou, Village Occitan, de 1294 à 1324*, pp. 185-186.

⁵⁸ Emmanuel Le Roy Ladurie, *Montaillou, Village Occitan, de 1294 à 1324*, p. 82.

⁵⁹ Emmanuel Le Roy Ladurie, *Montaillou, Village Occitan, de 1294 à 1324*, p. 69.

⁶⁰ Emmanuel Le Roy Ladurie, *Montaillou, Village Occitan, de 1294 à 1324*, p. 371.

⁶¹ Emmanuel Le Roy Ladurie, *Montaillou, Village Occitan, de 1294 à 1324*, pp. 364, 521.

⁶² Emmanuel Le Roy Ladurie, *Montaillou, Village Occitan, de 1294 à 1324*, pp. 318-319.

⁶³ Emmanuel Le Roy Ladurie, *Montaillou, Village Occitan, de 1294 à 1324*, p. 365.

好，相當簡陋。⁶⁴當地最全面的公共集會中心是教堂：雖然有人星期天不會去做彌撒，但是彌撒畢竟是一個全村居民參與的儀式，能夠不分男女老少都集合起來，算是固定的聚會日期。⁶⁵從性別的角度來看，男性的活動地點比女性更全面：農事工作的田地，在榕樹遮陽的廣場上或道路邊，都可以看到男人三五成群聊天、唱歌、下棋、玩骰子，⁶⁶勒華拉杜里認為，當地村莊廣場有如十九世紀無所不談的咖啡館。⁶⁷雖然蒙大猶的正式社交網絡幾乎是男性的天下，但是這並不表示女性只能待在家中。富尼耶的審訊資料顯示，婦女有屬於她們自己的社交活動：買賣乳酪、⁶⁸趕驢子去磨坊磨麥子、⁶⁹頭頂水罐到村外汲水、鄰居間相互商借日常用品、⁷⁰為家人或情夫抓蝨子。⁷¹在這些非正式場合中，女性充滿好奇心，喜歡問東問西，說三道四，彼此交換所知道的消息，因為當時人們都沒受過什麼教育，所以這些消息的可信度與男人聊天的內容不相上下，婦女的消息不會比男性的消息更不可靠。⁷²此外，蒙大猶

⁶⁴ Emmanuel Le Roy Ladurie, *Montaillou, Village Occitan, de 1294 à 1324*, pp. 399-400.

⁶⁵ Emmanuel Le Roy Ladurie, *Montaillou, Village Occitan, de 1294 à 1324*, p. 401.

⁶⁶ Emmanuel Le Roy Ladurie, *Montaillou, Village Occitan, de 1294 à 1324*, pp. 389-390.

⁶⁷ Emmanuel Le Roy Ladurie, *Montaillou, Village Occitan, de 1294 à 1324*, pp. 391-392.

⁶⁸ Emmanuel Le Roy Ladurie, *Montaillou, Village Occitan, de 1294 à 1324*, p. 380.

⁶⁹ Emmanuel Le Roy Ladurie, *Montaillou, Village Occitan, de 1294 à 1324*, p. 381.

⁷⁰ Emmanuel Le Roy Ladurie, *Montaillou, Village Occitan, de 1294 à 1324*, p. 382.

⁷¹ Emmanuel Le Roy Ladurie, *Montaillou, Village Occitan, de 1294 à 1324*, pp. 204-205.

⁷² Emmanuel Le Roy Ladurie, *Montaillou, Village Occitan, de 1294 à 1324*, pp. 382-383, 386.

⁷² Emmanuel Le Roy Ladurie, *Montaillou, Village Occitan, de 1294 à 1324*, pp. 389-390.

這座小山村裡面，除了擁有住家的定居農民之外，還有為數不少的流動牧民，牧民都是男性，這也意謂著：蒙大猶的現居村民以女性居多，而女性的人際網絡同時也成為純潔派可資運用的傳教資源。⁷³

蒙大猶流動牧民的營生方式是山牧季移。這些牧民之所以特別引起勒華拉杜里的注意，主要是因為他們在當時的政治權力架構之間飄移，難以管理，而且還在各地的家庭網絡中建立屬於他們自己的人脈。⁷⁴在打破村莊與國界限制的情況下，牧民的社交單位是「窩棚」(la cabane)：夏季的窩棚在法蘭西統治的底里牛斯山上，冬季的窩棚則位於西班牙管轄的加泰隆尼亞；來自不同地區、擁有不同信仰、隸屬不同文化的遊牧民聚集在窩棚，除了製作乳酪之外，還會彼此交換消息以及帶有異端色彩的想法，換句話說，窩棚具有額外的功能就是底層階級的「文化影響站」(un carrefour d'influences culturelles)：「這些文化影響具有異端性質，屬於純潔派或穆斯林的文化，它們來自遠方，在這裡交會。」⁷⁵由上述可知：異端信仰向底層百姓滲透的最有力傳播工具不是書籍，而是口語，傳教的場域不是在刻意為之的講壇，而是在日常生活中，於不經意的言談過程裡面進行，⁷⁶也因此勒華拉杜里才會以「騾背宣

⁷³ Emmanuel Le Roy Ladurie, *Montaillou, Village Occitan, de 1294 à 1324*, p. 379.

⁷⁴ Emmanuel Le Roy Ladurie, *Montaillou, Village Occitan, de 1294 à 1324*, pp. 108-109.

⁷⁵ Emmanuel Le Roy Ladurie, *Montaillou, Village Occitan, de 1294 à 1324*, pp. 155-158.

⁷⁶ Emmanuel Le Roy Ladurie, *Montaillou, Village Occitan, de 1294 à 1324*, p. 160.

講」(prédication ‘muletière’)形容奧堤耶兄弟的傳教方式。⁷⁷

雖然向不識字的底層平民宣講教義時，口語扮演核心角色，但是這並無法否定書籍也有助於知識傳播。在這個偏遠的小山村中，異端信仰是由奧堤耶兄弟的口語傳教開始，而他們是藉由閱讀才接觸到純潔派信仰。⁷⁸雖然從我們現在的角度來看，奧堤耶兄弟的藏書數量不豐，僅僅只有三冊，但是這在書籍罕見的蒙大猶來說，已經算是擁有一間「流通圖書館」(la bibliothèque circulante)，能夠透過出借書籍以普及書本中的文字知識；然而，除了借書給村莊識字人士之外，他們還會藉著參加家庭聚會之便，朗讀書中內容給在場的文盲平民聽，把書本中的危險知識進一步向下紮根。⁷⁹如同當時異端信仰者在接受審訊時所言，在大多數情況下，學習善行不是靠眼睛讀，而是用耳朵聽，所以傳教者的口才非常重要，才會有「金嘴」(Bouche d'or)或「天使嘴」(Bouche d'ange)的說法。⁸⁰換句話說，書籍在蒙大猶確實存在，但是數量不多，即使有，書本的文字知識還是得依靠嘴巴才會在社會中產生作用。

於是，我們可以在勒華拉杜里研究阿爾比異端傳播的個案中看到：與以往不同，他的研究眼光從社會上層轉向下層，在日常

⁷⁷ Emmanuel Le Roy Ladurie, *Montaillou, Village Occitan, de 1294 à 1324*, pp. 126, 128.

⁷⁸ Emmanuel Le Roy Ladurie, *Montaillou, Village Occitan, de 1294 à 1324*, p. 350. 奧堤耶兄弟出身公證人(notaires)，所以具有讀寫能力。

⁷⁹ Emmanuel Le Roy Ladurie, *Montaillou, Village Occitan, de 1294 à 1324*, pp. 354-355.

⁸⁰ Emmanuel Le Roy Ladurie, *Montaillou, Village Occitan, de 1294 à 1324*, p. 359.

生活的住家建築格局、親屬組織、性別意識、年齡結構等視角，瞭解書本知識滲透農村社會的實際狀況。《蒙大猶》以大量史料細緻重建異端知識的擴散網絡，證明菁英識字文化與平民大眾文化之間存在著某種程度的互動關係：書籍固然是其中的一個管道，但並不是全部，因為運用文字擴散知識的效果與今天相比，「更緩慢、更偶然」；⁸¹在更多的情況下，知識反而是以淺白的口語，在聊天、交際的日常生活場合裡流通，透過各式各樣的人際網絡深入基層。⁸²此外，勒華拉杜里還仔細爬梳史料，呈現歐洲中古晚期農村女性並不是被男性宰制的被動客體，而是擁有自己專屬社交活動的主體。於是，在以往的史學研究中被忽略的口語以及女性，在日常社交中重新找到它們的重要性，堅實的日常生活史研究確實能擴大傳統歷史學的視野，補其不足。

無獨有偶，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國，研究近代法國史的學者陸續發表許多研究成果，都呼應勒華拉杜里的分析視角：從底層社會的日常生活觀察歷史，並修正以往的主流歷史圖像。1975 年，在其〈印刷與平民大眾〉一文中，戴維絲 (Natalie Zemon Davis, 1928-) 建議：想要正確理解印刷術與平民大眾的關係，就必須放棄一廂情願的技術決定論，不能只憑印刷文本的內容就簡單認定某書籍的出版定然造成重大社會效應，而且書本中傳達的菁英文化未必影響平民大眾文化，所以一位稱職的研究者必須考察讀者在日常

⁸¹ Emmanuel Le Roy Ladurie, *Montaillou, Village Occitan, de 1294 à 1324*, p. 352.

⁸² Emmanuel Le Roy Ladurie, *Montaillou, Village Occitan, de 1294 à 1324*, p. 345.

生活中對於印刷書的各種反應，才能正確評估印刷術的發明在近代西方社會的重要性到底有多高。⁸³從近代法國鄉村的角度來看，農民在日常生活中對於印刷書籍的需求不大，即使書中知識與農業有關，農民也沒有購買的必要：不只他們的識字率低而且收入不豐，讀不懂也買不起價格高昂的印刷書，更重要的是，十六世紀農村居民的文化傳承管道主要是口語傳統，日常生活經驗與舊有的諺語格言已經足以傳承實用的耕種知識，印刷書的出現並沒有徹底瓦解農村根深蒂固的古老傳統。⁸⁴但是，宗教改革之後，透過新教徒的努力，新教書籍（尤其是方言聖經印本）還是真正打入近代法國的鄉村生活，並且提供農民某些新教的資訊，這個知識滲透的重要場合是夜間聚會：「如果有一個識字男性擁有書，他可能大聲唸出書中內容。」⁸⁵也就是說，朗讀的聲音是危險的書本知識擴散進入農村的最初管道。

如果換個角度從讀寫能力較好的城鎮工匠與零售商來看，他們對印刷書本的需求也沒有過去想像的那麼大。根據十六世紀巴黎與亞眠（Amiens）的死後財產清冊記錄，大多數巴黎工匠過世的時候連一本書都沒有，而每位亞眠工匠平均擁有的藏書量只有一冊。⁸⁶近代法國識字人士私人藏書不多的原因在於，工匠之間會

⁸³ Natalie Zemon Davis, 'Printing and the People', in *Society and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France*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192.

⁸⁴ Natalie Zemon Davis, 'Printing and the People', pp. 199-200.

⁸⁵ Natalie Zemon Davis, 'Printing and the People', p. 201.

⁸⁶ Natalie Zemon Davis, 'Printing and the People', pp. 209-211.

因工作認識而相互出借書籍，也可能因朋友關係把書當成禮物送人，甚至在缺錢花用的時候將書籍典當或賣出，轉手成為另外一位陌生人的物品，換句話說，在城市小人物之中，書籍經常在流動，而不是固定收藏在某人的書櫃裏面。⁸⁷而書籍的這種動態流動性也使得戴維絲強調：書籍不只是思想史家認為的觀念載體，同時也應該理解成為日常生活史家眼中足以呈現親疏差等人際網絡的「多重關係傳遞者」(a carrier of relationships)。⁸⁸此外，即使城鎮的書籍流通量要比農村來得大，文字也不可能完全壟斷近代城市居民取得知識的管道：城鎮亦有文盲，藉由團體聚會，書本內容經由識字者的朗讀得以傳播到不識字者的耳中。⁸⁹因此，戴維絲得出與勒華拉杜里類似的結論：印刷書籍的出現並沒有使得口語傳統趨於沉寂，⁹⁰不管在近代法國農村或城鎮，聚會中的交談仍然是重要的知識滲透管道。

另外一位美國學者丹頓 (Robert Darnton, 1939-) 採取類似哈伯瑪斯的研究取徑，強調通俗文學作品傳播啟蒙思想的重要性。丹頓認為：啟蒙運動不是由著名哲人及其作品所形成，反而是由一群知名度不高的職業寫手促成。他們受到朋友與同情者的支持與保護，在剛剛成形的文學市場中討生活，但是由於謀生不易，必須撰寫聳動人心、用字淺顯的大量通俗作品賺取稿費，這使得他們

⁸⁷ Natalie Zemon Davis, 'Printing and the People', pp. 212-213.

⁸⁸ Natalie Zemon Davis, 'Printing and the People', p. 192.

⁸⁹ Natalie Zemon Davis, 'Printing and the People', p. 213.

⁹⁰ Natalie Zemon Davis, 'Printing and the People', p. 214.

的書寫主題激進化且情色化，遊走於書籍審查體制的灰色地帶；出版商為了追求高額利潤，願意出版拿不到印刷執照的稿件，但是如果沒有走私業者看準禁書的市場銷售價值，走私非法圖書，意外促成禁書的跨國流通，啟蒙觀念或許不會快速擴散。⁹¹於是，跳脫以往只從菁英文人的作品考察十八世紀法國的研究視角，丹頓反而可以補充傳統歷史圖像的不足：啟蒙運動的參與者不是只有大咖人物，從知識擴散的角度來看，地下文學作品在觀念的傳播過程也扮演重要角色，所以籍籍無名的作家與伏爾泰、盧梭一樣重要。深感以往太注重菁英哲人思想的啟蒙史研究仍有漏網之魚，丹頓才會於 1984 年出版《法國文化史中的貓大屠殺與其它事件》中感嘆：「啟蒙運動期間，尚未被啟蒙者的心態世界似乎無可挽救，一去不回。」⁹²透過多種非正統的史料（民間故事、儀式、警方檔案、通俗小說），這位美國歷史學者試圖在日常生活細節中，拼湊並重建農民、工匠與貧窮文人的心態史與文化史。

1985 年到 1987 年，在法國歷史學界通力合作之下，《私人生活史》五冊陸續出齊，日常生活史的研究向前邁出一大步。其中，涉及近代的第三冊（從文藝復興到啟蒙）本來是由阿里業（Philippe Ariès, 1914-1984）籌畫、構思，但是他在 1984 年不幸過世，主編職務改由夏堤耶（Roger Chartier, 1945-）接手，並於 1986 年出版。為了

⁹¹ Robert Darnton, *The Literary Underground of the Old Regime* (Cambridge, 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1-40.

⁹² Robert Darnton, *The Great Cat Massacre and Other Episodes in French Cultural History* (1984)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5), p. 9.

紀念阿里業，夏堤耶特意挑選前者在逝世前一年發表的論文〈論私人空間之歷史〉，將之改題為〈支持書寫私人生活史〉做為第三冊全書的導論。

在此文中，阿里業強調，從中古到近代的西方社會中，個人意識日益提升，這個傾向具體呈現在日常生活的某些現象，他稱之為「自我的外在化」(*une extériorisation de soi*)，⁹³例如，自傳與日記的流行不只見證讀寫能力的擴展，也顯示個人意識的增長。⁹⁴然而，在阿里業眼中，住宅史或許最能反映重視個人的新趨勢：新的私人生活空間是在有教養的中、小貴族的文化環境中出現，房間變得越來越小，還興建出入某房間的專屬通道，以及暖氣的分配與輸送管線。⁹⁵這些室內建築風格的轉變都顯示，「十六世紀與十七世紀是日常生活中個人主義風俗習性獲得勝利的時期」。⁹⁶阿里業認為，這種新型的私人生活空間的發展並不在於尋求個人的孤獨，反而是以友誼為核心，邀請彼此信賴的親近友朋，舉行帶有公共性質的小型聚會以「共享孤獨」。⁹⁷這群關係親密的友人可能聚集在一個布置典雅的房間中，也可能圍繞在女主人的床鋪旁，不只隨意交談、朗讀書籍或評論內容，有時也會唱歌、

⁹³ Philippe Ariès, "Pour une histoire de la vie privée", in *Histoire de la Vie Privée*, t. 3 (Paris: Seuil, 1986), p. 12.

⁹⁴ Philippe Ariès, "Pour une histoire de la vie privée", pp. 11-12.

⁹⁵ Philippe Ariès, "Pour une histoire de la vie privée", pp. 10, 13.

⁹⁶ Philippe Ariès, "Pour une histoire de la vie privée", p. 14.

⁹⁷ Philippe Ariès, "Pour une histoire de la vie privée", p. 12.

演奏音樂或玩團體遊戲；十八世紀期間，一部分的團體逐漸組織化，成為學會、俱樂部，而沒走上體制化道路的聚會仍維持文學沙龍的形式繼續運作，但其重要性逐漸退居第二線。⁹⁸

在阿里業描述的這些日常生活的社交場合中，知識與娛樂並重，十八世紀聚會者的知識學習地點大多不在正式的教學機構內，而是於非正式的私人社交場合之中，因此知識傳遞的方式明顯不是只有藉助文字，還包括聽他人高聲朗讀或口語交談。雖然思想觀念的擴散不是阿里業此文的主題，但是它所提供的歷史圖像卻與勒華拉杜里在《蒙大猶》的研究成果高度吻合：從中古到啟蒙時期，思想的擴散必須從日常生活的角度觀察，知識傳遞不能獨尊書籍，口語也是重要工具，而人與人的社交活動是此議題的核心。雖然阿里業從建築格局、自傳與日記等文體的普及切入觀察個人意識的興起，視角高度類似哈伯瑪斯，但是在前者的文章中卻完全沒有引用《公共領域結構的轉型》，倒是夏堤埃在《私人生活史》第三冊〈第一部分引言〉中，討論十八世紀多元社交形式（文學結社、共濟會、俱樂部、咖啡館）之時，具體指出哈伯瑪斯公共領域概念的貢獻。⁹⁹

在《私人生活史》第三冊中，夏堤耶自己撰寫的文章〈寫作的實踐〉也收錄其中，部分內容正好涉及近代知識傳播的議題。

⁹⁸ Philippe Ariès, “Pour une histoire de la vie privée”, p. 15.

⁹⁹ Roger Chartier, “Introduction à la première partie”, in *Histoire de la Vie Privée*, t. 3 (Paris: Seuil, 1986), pp. 23-24.

這位法國史家首先指出：許多統計數據都顯示，十六世紀到十八世紀這段期間，全歐洲會寫自己名字的人數持續上升，¹⁰⁰但是仍有性別、階層與地區的差異：男性比例大於女性，社會經濟地位與簽名能力成正比。¹⁰¹雖然有這些細部差異，但是讀寫能力的普及與個人意識的提升卻密切相關：與文字的接觸可以使個人脫離群體的控制，退居私人空間中實踐閱讀行為，在獨處中進行反思，由此創造出個人與上帝之間直接溝通的全新關係；¹⁰²個人私下秘密閱讀的方式，不只跳過教會而營造出更為私人化的信仰，也可能帶來前所未見大膽行為，也就是異端；¹⁰³當閱讀行為成為個人全新的親密夥伴之後，住家中的書房從此成為個人沉思之處。¹⁰⁴夏堤耶認為，閱讀私人化所帶動的「個人親密性」(l'intimité individuelle)是近代歐洲許多重要變化之一，而閱讀方式從高聲朗讀轉變成為靜默閱讀的閱讀革命則是背後最重要的推手。¹⁰⁵雖然靜默閱讀的方式逐漸出現，但是夏堤耶不忘強調，從十六世紀到十八世紀，親密友人聚會之時的高聲朗讀仍然是建立社交的重要因素；在朗讀聲中，書籍結合了三種不同的社交性質於一身：文

¹⁰⁰ Roger Chartier, "Les pratiques de l'écrit", in *Histoire de la Vie Privée*, t. 3 (Paris: Seuil, 1986), p. 114.

¹⁰¹ Roger Chartier, "Les pratiques de l'écrit", p. 114.

¹⁰² Roger Chartier, "Les pratiques de l'écrit", p. 119.

¹⁰³ Roger Chartier, "Les pratiques de l'écrit", p. 127.

¹⁰⁴ Roger Chartier, "Les pratiques de l'écrit", pp. 135-136.

¹⁰⁵ Roger Chartier, "Les pratiques de l'écrit", p. 126.

化素養、功名利祿、友誼聯繫。¹⁰⁶這就顯示：聲音仍然是近代歐洲獲取知識的重要媒介，抄本手稿或印刷書籍並不是只有傳遞思想的功能，同時也具備社交用途。¹⁰⁷

此外，主編夏堤耶不只注意男性社交網絡，更把研究眼光延伸到女性社交，例如《私人生活史》第三冊中收錄卡絲棠（Nicole Castan, 1926-2009）討論近代女性公共領域的文章。這位土魯斯大學近代史教授指出，雖然父權主宰舊制度時期的家庭，但是家中成員總是可以找到避開家庭控制的方法。¹⁰⁸以家中最弱勢的孩童來說，男孩上學與返家途中就擺脫家長控制，¹⁰⁹而中等階級的女孩則趁在修道院學習識字的機會結交自己的朋友。¹¹⁰不只小孩可能建立自己的社交網絡，家中的女主人同樣擁有不受丈夫控制的自主空間：由於負責管理家庭事務，妻子可以負責遴選家中女僕並指揮傭人工作。¹¹¹為了經辦日常生活瑣事，婦女必須走出家門，洗衣、汲水、找柴火、磨麥子、烘培食品，於是，家門口、道路中、公共廣場、泉水邊、磨坊等處所都可以看到女性聚集、交談的身影，所以卡絲棠才會強調，對於近代歐洲婦女來說，「友誼社交」（la sociabilité amicale）並不是一句空話，而是確實存在於日

¹⁰⁶ Roger Chartier, “Les pratiques de l’écrit”, pp. 147-148.

¹⁰⁷ Roger Chartier, “Les pratiques de l’écrit”, p. 150.

¹⁰⁸ Nicole Castan, “Le public et le particulier”, in *Histoire de la Vie Privée*, t. 3 (Paris: Seuil, 1986), p. 414.

¹⁰⁹ Nicole Castan, “Le public et le particulier”, pp. 414-417.

¹¹⁰ Nicole Castan, “Le public et le particulier”, pp. 422-423.

¹¹¹ Nicole Castan, “Le public et le particulier”, p. 419.

常生活之中。¹¹²再加上婦女永無止境的好奇心，好問又愛講，一聊起天來，抱怨老公或轉述他人耳食之言，無所不談，搞到當時好像沒有任何秘密可言，卡絲棠稱之為「全景敞視的聚會」(*sociétés de panoptique*)。¹¹³所以，在卡絲棠眼中，近代歐洲公私領域的界線仍在變動，並未完全確定，¹¹⁴我們不能遽下定論，認為當時的女性屬於勢孤力單的絕對弱勢者，因為她們擁有強而有力的武器：在社交活動中，揭露私人醜聞，促成公共輿論，進而在社會控制方面扮演重要角色，足以成為家庭道德的守護者。¹¹⁵

從《私人生活史》第三冊的部分內容來看，許多主題在前人著作中都可以看到，例如：住宅空間、沙龍聚會、通俗文學等主題延續哈伯瑪斯、丹頓的討論，至於人際網絡、社交聚會、關注底層與女性等面向則類似勒華拉杜里、戴維絲與丹頓的觀察角度，但是編者夏堤耶還在既有的日常生活研究基礎之上，運用閱讀革命的概念，從另外一個角度襯托出十八世紀知識性聚會中口語交流的無可取代性。既然社交與口語是近代歐洲知識傳播的重要管道，我們可以預期：當夏堤埃日後試圖討論啟蒙觀念的擴散時，社交與口語必然是分析重點。

1990 年，為了紀念法國革命爆發兩百周年，夏堤耶出版《法國革命的文化起源》。這位法國學者自言：研究法國革命的成因不

¹¹² Nicole Castan, "Le public et le particulier", p. 423.

¹¹³ Nicole Castan, "Le public et le particulier", p. 426.

¹¹⁴ Nicole Castan, "Le public et le particulier", p. 423.

¹¹⁵ Nicole Castan, "Le public et le particulier", p. 427.

可避免一定會觸及啟蒙運動，但是他關注的對象與卡西勒、蓋伊都不同：前者聚焦法國革命的文化起源而不是思想起源，而改換觀察視角的目的在於夏提耶想研究當時人信以為真的想法或者感知事物的變動，而不是注重理性思辨所形成的思想體系，¹¹⁶也就是說，在夏提耶眼中，藉由文化體制、社交形式、溝通方式、再現（*représentations*）等社會脈絡的重建，反而使得某些政治誹謗、八卦爆料比起理性思辨的哲學著作更能還原革命之前的時代氛圍。這種以文化取代思想的分析角度，不只可以擴大我們對於十八世紀法國的理解，還能改變以往對於啟蒙運動的狹隘定義：傳統史家一般主張，啟蒙運動是由邏輯清楚且進步開明的觀念所構成，但是現今學界傾向認為啟蒙運動是由「不具有明確論述的一堆實踐所雜湊而成」，¹¹⁷而且根據丹頓的研究，當時最受讀者歡迎的書籍並不是哲士的偉大作品，而是情色文學、政治諷刺意味濃厚的小冊子。¹¹⁸

政治的批評源自於公共領域的出現。運用哈伯瑪斯《公共領域結構的轉型》中所提出的概念，夏提耶進一步指出，在十八世紀期間，獨立於國家權威之外的文學公共領域逐漸形成，一方面顯示這個公共領域的參與者具有自由批評的精神，¹¹⁹但是另一方

¹¹⁶ Roger Chartier, *Les Origines Culturell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aris: Seuil, 1990), p. 10.

¹¹⁷ Roger Chartier, *Les Origines Culturell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p. 28-29.

¹¹⁸ Roger Chartier, *Les Origines Culturell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 99.

¹¹⁹ Roger Chartier, *Les Origines Culturell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p. 188-189.

面也顯示，許多法國文人作家在得不到宮廷職位或王室贊助的情況之下，成為「異化知識分子」(intellectuels aliénés)，大力批判現有政權，使得文學公共領域日漸政治化，促成了革命前夕的政治風潮。¹²⁰這批自力謀生作家的出現，再加上十八世紀中期以降，出版商支付金錢購買手稿，靠寫作維持生計的文人作家成為當時大型叢書各式條目的主力寫手；初步成形的商業性文學市場不只創造出寫作各式各樣作品的職業作家，也營造出文人不受政府掌控的必要條件，也就是經濟層面的獨立。¹²¹

雖然十八世紀可供閱讀的印刷讀物非常多元，但是我們不應該只顧分析文本內容而忽略讀者閱讀行為的複雜性。夏提耶強調，讀者的閱讀行為並不像在軟蠟上雕刻那麼簡單：從讀者的角度來看，他不必然完全相信作者所言，有可能在閱讀過程中自行詮釋作者的意義，有時過度放大，有時錯誤解讀，也就是說，書寫的內容會被讀者選擇性接受，文本提供的意義是由作者與讀者共同互動所造成的結果。¹²²如果考慮文本本身的意義是多元浮動而不是固定單一，啟蒙思想的形成與傳播就不是一個靜態的簡單過程，而是在人際溝通、社交活動中動態創造的產物。¹²³於是，在二十一世紀前夕，啟蒙運動的研究取徑開始脫離理性建構的思想體系及其傳承關係的探索，轉向解讀時人信以為真的爆料傳

¹²⁰ Roger Chartier, *Les Origines Culturell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p. 231-232.

¹²¹ Roger Chartier, *Les Origines Culturell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p. 75-77.

¹²² Roger Chartier, *Les Origines Culturell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 104.

¹²³ Roger Chartier, *Les Origines Culturell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p. 30-31.

聞，並且透過社交聚會、地下出版品、情色文學的分析，試圖重建政治誹謗與謠言之所以產生的複雜脈絡。

四、結論

1995 年，美國歷史學者巫純（Dorinda Outram, 1949-）的《啟蒙運動》面世。書中，她以一整章的篇幅回顧二十世紀有關啟蒙史研究的重要作品，並且做出評論。巫純首先指出，美國史家蓋伊的兩卷本《啟蒙運動：一個詮釋》主宰了 1960 年代有關啟蒙史的看法：蓋伊的著作基本上承繼卡西勒的思想史研究視角，主張十八世紀的啟蒙是具有高度一致性的思想運動，其重要觀念主要是由一群哲士的經典作品中產生，雖然蓋伊對於啟蒙時期的描述迭有創新見解，但是他比較少關注形塑思想觀念的社會脈絡，而且他所討論的思想家全是男性，導致在其作品中缺少十八世紀女性對於啟蒙觀念的反應。¹²⁴

此外，巫純觀察到啟蒙史研究視角的轉變。1970 年代以降，史家更加關注啟蒙的社會背景，也就是觀念如何被社會傳播、運用與回應，這與當時的社交網絡（sociability）密切相關；而在探討社會如何運用觀念的同時，研究者也越來越注意到一些以前歷史上沒沒無名作家的重要性，因為這些職業寫手的著作流傳更廣，並透過前述的社交網絡形成改變社會的力量。¹²⁵也由於注意

¹²⁴ Dorinda Outram, *The Enlighten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4.

¹²⁵ Dorinda Outram, *The Enlightenment*, p. 7.

到新的研究視角，巫純在其著作特別著重彌補蓋伊研究的不足之處，尤其是知識傳播與性別議題。

談論知識傳播課題時，巫純主要由兩個部分切入，一個是知識傳播的地點，另外一個則是傳播媒介。知識傳播的處所也就是公共空間，包括廉價租書攤、書店店面、咖啡館、¹²⁶共濟會聚會所、¹²⁷省區學會、¹²⁸沙龍。¹²⁹這些體制化或非體制化的新聚會場所，主要目的是在觀念的討論，而不是炫耀政治與社會地位，所以出身不同階層的人得以聚集在一起，進行意見交流，巫純把這種現象稱之為「新的社交形式」(new forms of sociability)。¹³⁰從這些新聚會場所的交談之中，帶有批判色彩的「公共輿論」(public opinion)也逐漸出現。¹³¹

傳播媒介可以分為口語以及文字。在前面提到的新聚會場所中，知識傳播的交流媒介明顯是口頭的對話。至於文字形式的傳播媒介，巫純提到報刊雜誌¹³²以及小說¹³³，尤其側重後者。例如，討論科學知識、異國文化在十八世紀的擴散時，這位美國歷史學者分別以英國小說家史威夫特 (Jonathan Swift, 1667-1745) 的《格列佛

¹²⁶ Dorinda Outram, *The Enlightenment*, p. 20.

¹²⁷ Dorinda Outram, *The Enlightenment*, p. 25.

¹²⁸ Dorinda Outram, *The Enlightenment*, p. 26.

¹²⁹ Dorinda Outram, *The Enlightenment*, pp. 91-93.

¹³⁰ Dorinda Outram, *The Enlightenment*, p. 25.

¹³¹ Dorinda Outram, *The Enlightenment*, p. 30.

¹³² Dorinda Outram, *The Enlightenment*, p. 20.

¹³³ Dorinda Outram, *The Enlightenment*, p. 21.

遊記》以及笛福 (Daniel Defoe, 1660-1731) 的《魯賓遜漂流記》做為切入點。¹³⁴

接下來，巫純由知識傳播的討論進一步延伸到性別議題。她強調：沙龍是十八世紀最具特色的知識傳播體制，而且沙龍談話會的主持人主要是由社會上層女性擔任，但是當男性的權利與自主性逐漸增加之時，女性卻依然被要求依賴並服從男性，這是啟蒙時期男女兩性之間的巨大差異。¹³⁵我們可以說，巫純反省二十世紀啟蒙史的研究現況，並且對於傳統研究取徑的不足之處進行補充，難怪她的著作被英國歷史學者波特 (Roy Porter, 1946-2002) 譽為：「有關最近史學研究趨勢討論的最佳現代著作，是對於蓋伊的有價值修正。」¹³⁶針對啟蒙史的研究走向，波特也有類似巫純的觀察：從思想史的角度研究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有一個最大盲點，也就是使得思想觀念與外在社經脈絡割離，「把活生生的人化約為印刷書籍上的學說」。¹³⁷為了修正這個缺陷，史家才從傾向菁英大人物的思想轉向關注產生啟蒙的「溫床」(seedbed)。¹³⁸

回顧整個二十世紀啟蒙史的研究軌跡，我們可以清楚看到，雖然蓋伊宣稱想要探討思想家浸潤其中的「文化氛圍」，但是他費盡心血撰寫的《啟蒙運動：一個詮釋》仍然是以觀念史為主要視

¹³⁴ Dorinda Outram, *The Enlightenment*, pp. 47, 63-64.

¹³⁵ Dorinda Outram, *The Enlightenment*, p. 81.

¹³⁶ Roy Porter, *The Enlightenment*, second edition (Hampshire: Palgrave, 2001), p. 79.

¹³⁷ Roy Porter, *The Enlightenment*, second edition, p. 39.

¹³⁸ Roy Porter, *The Enlightenment*, second edition, p. 5.

角，搭配啟蒙哲士往來活動的少數內容做為解釋觀念流通的背景，蓋伊初步走出了啟蒙觀念史的研究侷限，但是還沒有完全做到以觀念的社會史取代觀念史。我們或許可以說，《啟蒙運動的哲學》以及《啟蒙運動：一個詮釋》都太注重探討啟蒙思想的內在邏輯關聯，而對於產生這些觀念的外部文人社交活動、知識傳播管道等議題著墨不多，而且關注男性社會菁英遠遠超過女性與底層平民。1970 年代之後，歷史學家越來越注意研究促成知識傳播的動態面向，於是日常生活的社交成為核心焦點：住家室內格局的變化、鄉村夜間聚會、城市沙龍、文人俱樂部、女性活動、通俗作品的流傳、書籍知識的口語散播等主題，無一不與重建十八世紀知識傳播的溫床有關，不只具體凸顯啟蒙運動的社交性，還使得啟蒙史的書寫生活化。學術研究焦點的轉移也帶動歷史教學內容的改變，才會出現出版於 1950 年代的《世界文明史》涉及啟蒙運動的內容只著重介紹十八世紀菁英哲人的著作，缺乏十八世紀資訊傳遞環境的說明，而最近新出的《西方：一部新的歷史》則強調啟蒙思想滲透普及的社交環境與媒介，而內容腥羶的地下出版品在傳播過程中也扮演重要的角色。

2006 年，在新出版《啟蒙運動概論》中，巫純強調：「社交是啟蒙運動的核心」，而社交聚會所需要的消費品（茶、咖啡、巧克力、糖）都不是歐洲本地物產，都必須進口，所以啟蒙運動高度依賴當時全球貿易的成長才得以維持。¹³⁹聚會期間，參與成員除

¹³⁹ Dorinda Outram, *Panorama of the Enlightenment*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了享用物質性的飲饌食品之外，當然免不了彼此談話，對談主題可能從最嚴肅的哲學思想到難以證實的八卦爆料，而觀念與資訊遂得以藉由口語逐步擴散。因此，巫純提出社交啟蒙（sociable Enlightenment）的概念，彌補過去啟蒙史研究太過注重書籍內容分析的缺點，希望未來的研究者也應該注重觀念傳播的日常生活脈絡。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我們可以知道：啟蒙時期不只是閱讀的時代，同時也是對話的時代，¹⁴⁰而在社交活動的場合中，口語和文字一樣，都對於啟蒙思想的擴散有相同的貢獻。

2006), p. 62.¹⁴⁰ Dorinda Outram, *Panorama of the Enlightenment*, pp. 56, 66.

徵引書目

一、西文

- Ariès, Philippe, “Pour une histoire de la vie privée”, in *Histoire de la Vie Privée*, t. 3, Paris: Seuil, 1986, pp. 7-19.
- Berlin, Isaiah, ‘The Philosophers of Enlightenment’, *The Power of Ideas*, edited by Henry Hardy,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36-52.
- Burns, Edward McNall, Philip Lee Ralph, Robert E. Lerner, Standish Meacham, Alan T. Wood, Richard W. Hull, *World Civilizations: Their History and Their Culture*, ninth edition, 2 vol.,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1997.
- Cassirer, Ernst, *The Philosophy of Enlightenment* (1932), translated by Fritz C. A. Koelln and James P. Pettegrove, with a new foreword by Peter Gay, Princeton and Lond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 Castan, Nicole, “Le public et le particulier”, in *Histoire de la Vie Privée*, t. 3, Paris: Seuil, 1986, pp. 413-453.
- Chartier, Roger, “Introduction à la première partie”, in *Histoire de la Vie Privée*, t. 3, Paris: Seuil, 1986, pp. 22-25.
- Chartier, Roger, “Les pratiques de l’écrit”, in *Histoire de la Vie Privée*, t. 3, Paris: Seuil, 1986, pp. 113-161.

-
- Roger Chartier, *Les Origines Culturell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aris: Seuil, 1990.
- Darnton, Robert, *The Literary Underground of the Old Regime*, Cambridge, 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 Darnton, Robert, *The Great Cat Massacre and Other Episodes in French Cultural History* (1984),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5.
- Davis, Natalie Zemon, 'Printing and the People', in *Society and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France*,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 189-226.
- Gay, Peter, *Voltaire's Politics: the Poet as Realist* (1959),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5.
- Gay, Peter, *The Enlightenment: An Interpretation*, 2 vol., (1966 and 1969),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Press, 1995.
- Grafton, Anthony and David A. Bell, *The West: A New History*,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2018.
- Habermas, Jürgen,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1962), translated by Thomas Burger with the assistance of Frederick Lawrenc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1989.

- Kant, Immanuel, “An Answer to the Question: ‘What is Enlightenment?’”, in *Political Writings*,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Hans Reiss, translated by H. B. Nisbet, second e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54-60.
- Le Roy Ladurie, Emmanuel, *Montaillou, Village Occitan, de 1294 à 13249* (1975), édition revue et corrigée, Paris: Gallimard, 1982.
- Outram, Dorinda, *The Enlighten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 Outram, Dorinda, *Panorama of the Enlightenment*,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2006.
- Porter, Roy, *The Enlightenment*, second edition, Hampshire: Palgrave, 2001.

二、中文

- 康德著，李明輝譯，〈答何謂啟蒙？〉，收入《聯經思想集刊》，第一期，臺北：聯經出版，1988，頁 1-12。

